

论“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

——以 1976—1978 年为考察中心

武善增

内容提要 “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包括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与文学文本话语的转换两个方面。本文以“文革文学”话语为参照背景,通过对 1976—1978 年“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瓦解过程、“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颠覆状况的综合考察,对“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时间分界线以及“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起点,提出了新的看法。

关键词 “文革文学” “新时期文学” 话语转换 话语起点

武善增,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 211171

所谓“文革文学”话语,这里指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后出现的、由一定的政治权力派别精心设计、借助国家机制强力推行、表达激进的意识形态诉求的文学话语现象。“文革文学”话语有一套完整的规范体系,在这套规范体系的指导和制约之下,“文革文学”形成了一套基本的话语模态。所谓“新时期文学”话语,指“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出现的不符合“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要求、对“文革文学”话语模态构成了颠覆的文学话语现象。“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不仅表现在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上,更表现在文学文本话语的转换上。由于 1976—1978 年公开出现的抒情话语与“文革文学”抒情话语在形态上基本一致,所以这一时期文学文本话语的转换,主要是指叙事话语的转换。

一、“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与话语模态

“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是“文革”发动前夕建立起来的。1966 年 4 月发布的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其完成的标志。1968 年提出、1969 年进一步修定的“三突出”创作原则,使“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进一步得以完善。

“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核心内容,是“根本任务”论,即“要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1]。围绕着“根本任务”论这一核心理论规范,还有两套文学规范构成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项目批准号 11&ZD11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革’主流文学话语研究”(项目批准号 12BZW093)阶段性成果。

[1]《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北京〕《人民日报》1967 年 5 月 29 日。

了“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重要内容。第一,塑造怎样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规范。这里有两个基本要求。首先,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是“高大完美”的形象:“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1],”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的倡导者“总是竭力反对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认为只有写了英雄人物的‘缺点’,英雄人物才显得‘真实可信’。”^[2]其次,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政治高度上进行塑造:“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3]“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高就高在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美就美在他们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4]总之,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政治高度上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怎样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规范。这一类创作规范,“文革”以前大都出现过,如“两结合”创作方法论、“三结合”创作方式论、“主题先行”论、“题材决定”论、反“真人真事”论等等。“两结合”创作方法,是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在1964年北京现代戏观摩演出前后,被高调宣扬。“三结合”创作方式论,即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提出的“抓创作的关键是把领导、专业、群众三者结合起来”^[5]。江青还说:“我最近研究了《南海长城》的创作经验,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先由领导出个题目,剧作者三下生活,并且亲身参与了一次歼灭敌人特务的军事行动。”^[6]这是对“主题先行”的公开肯定,“领导出思想”是放置于最重要地位的,所以,“主题先行”论事实上脱胎于“三结合”创作方式论。另外,《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判了所谓“黑八论”,其中有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所以,“题材决定”论、反“中间人物”论等,就成了堂而皇之的“文革文学”话语的清规戒律。

“三突出”创作原则论的提出,虽然在“文革”时期被捧得很高,影响广泛,但它依然属于怎样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规范范畴。1968年5月,于会咏撰文首次提出“三突出”这一概念^[7]。1969年姚文元将“三突出”的内容修定为:“在所有人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并将“三突出”规范升格为“无产阶级文艺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8]。“三突出”创作原则论是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具体方法上的一种总结,是确保“根本任务”论得到落实的另一个重要的创作规范。

在“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指导与制约之下,“文革文学”形成了一套模式化的话语形态。这种话语模态的基本表现,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必须有一个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矛盾结构,这种矛盾结构决定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必须有一个对立面即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与阶级敌人即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矛盾必须是尖锐的,斗争必须是激烈的。另外,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是高大完美的,不能有任何有损于英雄形象的缺点。他们不仅政治觉悟高,未卜先知,料事如神,善于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识破敌人的鬼蜮伎俩,而且能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人一出场,再大的矛盾与问题迎刃而解。甚至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外表也必须是高大英武的形象:“领头登上岸的是政治指导员梁林。这个三十七岁的海军干部,是一个钢铸铁打般的汉子。从波浪里往起一立,身材高大魁梧。一步跨上岸岩,在峻峭的石礁上一站,十分威武、英俊。他

[1][3]《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北京〕《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

[2]《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北京〕《人民日报》1974年6月15日。

[4]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反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革命文艺》,〔北京〕《人民日报》1974年7月16日。

[5][6]江青:《谈京剧革命》,〔北京〕《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

[7]于会咏:《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上海〕《文汇报》1968年5月23日。

[8]《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北京〕《红旗》杂志1969年11期。

利利索索地脱去潜水衣,亮出铁轴一样的胳膊。伸手摘去潜水罩,露出一副刚毅的脸,方正的黑红脸膛,高高的鼻梁,一双闪着深邃、锐利目光的眼睛,两道浓重的眉毛。”^[1]与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高大完美相映衬,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则被妖魔化、丑陋化、猥琐化:“树影里,周永振像一座塔似的立着,摆动着大手讲话;歪嘴子在几个蹲着的人中间,像一只刚从水里打捞上来的虾米,弯着腰,战战兢兢的。”^[2]在这里,“周永振”是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而“歪嘴子”则是丑陋、猥琐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矛盾结构中塑造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这一话语模态构成了“文革文学”话语的基本特征。

二、瓦解“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策略与理论限度

“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话语转换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理论话语的转换。“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是怎样瓦解的?“新时期文学”发生期的理论话语又是怎样建构起来的?二者存在怎样的关联?这是我们考察理论话语转换的基本内容。

我们知道,“文艺黑线专政”论对“十七年文艺”是根本否定的:“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3]。“文艺黑线专政”论是“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确立起来的理论前提: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发起揭批“四人帮”第一个战役之后,围绕着如何评价“十七年文艺”的问题,有三种政治话语在进行博弈:第一种是坚持“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极左派”政治话语。此时“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但“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极左观点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宣示着一种坚挺的话语力量的存在;第二种是“凡是派”的政治话语。所谓“凡是派”,是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的总称。“两个凡是”观点的内容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4]“凡是派”主张批判“四人帮”的限度是不能否定“文革”,所以他们认为在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不能连“文艺黑线”论也一同否定掉;第三种是想改变“文革”政治现状的“改革派”的政治话语。“改革派”不仅要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而且要彻底推翻“文艺黑线”论。三种政治话语力量的博弈状态和走向,深刻地影响了“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理论话语转换的过程。

“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真正瓦解,是在揭批“四人帮”第三个战役的过程中完成的。1977年9月23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三)》下发,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第三个战役,着重揭批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表现^[5]。但是,由于“两个凡是”思想的存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很难向纵深推进。以教育领域为例,邓小平早在1977年9月19日就指出“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对建国后十七年教育工作的定性是歪曲事实的,应予推翻^[6],但因为出台“两个估计”的文件是经毛泽东画了圈的,所以教育部仍顾忌重重,直到在迟群笔记上发现了毛泽东关于建国后教育问题的与“两个估计”观念相左的谈话,才敢发表文章进行批判^[7]。文艺领域与教育领域的不同,是毛泽东早在1963年和1964年就有两次对文艺问题的批示,并且,毛泽东对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

[1] 闵国库:《风云岛》,〔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2] 浩然:《金光大道》(第1部),〔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页。

[3]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北京〕《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

[4] 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北京〕《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

[5] 社论:《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北京〕《红旗》杂志1977年第10期。

[6] 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7] 教育部大批判组:《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北京〕《红旗》杂志1977年第11期。

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了三次修改。鉴于此,1977年10月2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仍不敢公开提出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但教育领域推倒“两个估计”,还是推动和影响了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进程。“凡是派”力图使“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以不否定“文艺黑线”论为前提,因为一旦连“文艺黑线”论也否定,就有可能导致全盘否定“文革”。这导致了文艺界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时,又强调“十七年”文艺界确实有着一条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人民日报》对1977年11月21日本报编辑部召开座谈会的情况进行报道,其“编者按”说:“四人帮”举着“黑线专政论”这把刀子,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就,并从文艺界打开“突破口”,扩展到各条战线,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伟大成就。而事实上,“毛主席的红线一直照耀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程”^[1]。但“编者按”又肯定了毛泽东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界的两个批示,这又是和“编者按”的主调极不协调的。另外,《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一篇报道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情况的文章中,有一个“编者按”,明确提出“十七年”存在着一条“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十七年的文艺战线,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黑线,对我国文艺事业确实有过相当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总的说占主导地位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2]既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又肯定“文艺黑线”,这种矛盾的措辞,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很大混乱。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上,发起了对“两个凡是”僵化思想的挑战,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1978年7月《文艺报》的复刊号上,茅盾撰文指责“四人帮”“在文艺领域另立一套帮规帮法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3]。1978年10月20-25日在北京远东饭店,召开了《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三家刊物的编委会联席会议。这是一次以真理标准问题为主旨的会议。在会上,张光年认为不仅“文艺黑线专政”论应该推翻,而且“文艺黑线”论也是不存在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被推翻了,至少没有人公开为它辩护了。但还有一种说法:文艺黑线的帽子却不能摘掉。黑线是有的,那就是刘少奇的文艺黑线。这是改组以前的《光明日报》提出的,现在已经是光明的《光明日报》了。那时许多同志感到惶惑。当时我们在会议上反驳了这种说法。我不赞成这种说法。现在也不赞成。”^[4]中国作家协会三个刊物编委会联席会议之后,许多省市的文艺界也相继召开了以真理标准问题为主题或指针的座谈会。这些会议在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中,进一步推动了文艺界思想解放的时代洪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2月下旬广东省召开的文学创作座谈会。林默涵在会上发言说:“文艺创作上的所谓禁区,大概发生在这几个方面:一、是不是有某种题材不准写的?二、是不是有某种人物是不准写的?譬如说‘中间人物’。三、是不是有某种艺术样式是不能用的?譬如说悲剧。我认为,所有这些方面,都不应该有任何禁区。”^[5]这实际上标示了“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已经走向了全面的瓦解。

综上所述,回到“十七年”,借重新评价“十七年文艺”来逐步瓦解“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成了文艺领域的“改革派”谨慎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通过对“十七年文艺”的重新评价,尤其是借助真理标准问题对“十七年文艺”的重新评价,“改革派”不仅推翻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也推翻了“文艺黑线”论。最重要的是,“改革派”在“凡是派”的高压和阻挠之下,巧妙绕开敏感的政治雷区,直接参与

[1]《人民日报》“编者按”:《坚决推倒、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北京〕《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5日。

[2]《光明日报》“编者按”:《打好文艺战线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次战役》,〔北京〕《光明日报》1977年12月7日。

[3]茅盾:《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京〕《文艺报》1978年第1期。

[4]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5]林默涵:《总结经验,奋勇前进——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广州〕《作品》1979年第4期。

到一个个具体的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之中,这些具体理论问题,都是“十七年”曾经出现过、“文革”中被作为“黑论”批判的。这实际上是借重回“十七年”历史现场,来对“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一个个具体的堡垒,发起了有力的攻击。例如,1977年10月2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此时“文艺黑线专政”论尚不能公开否定,但李准和陈骏涛已经就题材和英雄人物的“高大完美”问题提出了看法:题材应该再扩大,“科学方面、教育方面的题材,也应该大力提倡”^[1]。“生活的范围有多么广阔,文艺的题材范围也就有多么广阔。”^[2]“是否把正面人物写成成长中的人物?在不损害人物品质的前提下,也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3]这些观点其实是对“题材决定”论与英雄塑造“高大完美”规范的一种公开否定。再如,在1977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召开的文艺界人士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上,茅盾抨击了“四人帮”人物描写的脸谱化的创作方法^[4]。在1977年11月28日至31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在京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和文学编辑座谈会上,夏衍提到了“中间人物”“不是不能写,问题是怎么写”的问题^[5]。题材问题、英雄人物塑造问题、中间人物问题,这些在“十七年”中曾被提出和讨论,后被“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套上紧箍咒的文艺理论问题,在“文艺黑线”论尚没有被批判,甚至“文艺黑线专政”论还没有被否定的情况下,就已经被触及和“松绑”,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理论支持。但这也说明,“新时期文学”初期的理论话语只是对“十七年文艺”理论观点一定范围和程度的恢复,“十七年”曾经出现的另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如“论文学是人学”、“论人情”、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等,在这一时期都还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不敢提及。所以,“新时期文学”初期根本谈不上什么新的文学理论的探索和建构,这显示了“新时期文学”发生期理论建构方面巨大的局限性。

三、颠覆“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三种叙事流向

除了理论话语的转换,“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话语转换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文本话语的转换。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直至12月揭批“四人帮”第一个战役的打响,“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与话语模态仍一统天下。进入1977年,文本文学话语开始出现了变动,如茹志娟的小说《出山》^[6]在写“万石头”英雄形象高大完美的同时,也写了他的执拗、认真、朴实,对山林的熟悉和热爱,有一定真实的生活气息,万石头的对立面“大张”、“老朱”、“我”,也没有被作为“阶级敌人”予以妖魔化。再如萧育轩的《心声》^[7]在塑造厂长“梅雪玉”这一英雄形象时,竟然写到了她像大姐一样对职工爱情问题的关心。但是,这些作品的叙事视角仍是“阶级斗争”,叙事目的仍是塑造和歌颂“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这决定了它们对“文革文学”话语模态只存在局部的一定程度的疏离,而不是根本的颠覆。

1977年最早对“文革文学”话语模态构成了根本颠覆的作品,是贾大山的小说《取经》,而且由《取经》发轫,出现了以“社会问题”与“社会新气象”为视角和表现内容的彻底颠覆“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叙事流向。1976年12月后,随着揭批“四人帮”的第一、第二、第三个战役次第展开,文学创作鲜明的政治主题,当然是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科技、军

[1]李准:《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及其它》,[北京]《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2]陈骏涛:《题材是广阔的》,[北京]《人民文学》1977年第12期。

[3]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4]茅盾:《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北京]《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5日。

[5]本刊记者:《热烈欢呼华主席的光辉题词,向“文艺黑线专政”论猛烈开火——记本刊编辑部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北京]《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6]茹志娟:《出山》,《上海文艺》1977年第1期。

[7]萧育轩:《心声》,[北京]《人民文学》1977年第4期。

事、党务等各领域所造成的危害,并以此为视角,塑造了反抗“四人帮”或者受“四人帮”迫害的人物。这样的小说,我们称之为“社会问题”小说。《取经》最大的突破,首先在于结构设置对“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颠覆。《取经》写王庄的支书王清智准备搞“开膛破肚,掏沙换土”的工程,上边开始批判“唯生产力论”,他怕受批判,于是停了工程,还写文章跟风批判;倒是李庄的支书李黑牛不管这一套,他从王庄取经回去,带领社员在河滩地“开膛破肚,掏沙换土”,让河滩地变成肥沃的大寨田,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结构视角不再是“阶级斗争”视角,而是“社会问题”视角,即“四人帮”专制路线破坏农业生产的社会问题视角。《取经》另一个最大的突破,表现在李黑牛、王清智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上。李黑牛不再是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而是一个喜咬“死理”的外表极为普通的干部形象:“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李黑牛站起来。我踮起脚尖一看,他有五十多岁年纪,小矮个,瘦巴脸,身穿粗布小棉袄,头扎一条旧毛巾,是个土眉土眼的庄稼人。只见他手提一件明晃晃大锅,笑眯眯地朝人群里走去。”^[1]李黑牛认的“死理”,是人不吃飯不行,农民不种地不行。这种外在形象和精神境界,是对“文革文学”话语中无产阶级英雄必须“高大完美”规范的彻底颠覆。小说另一个重要人物王清智虽然有着跟政治运动风的毛病,但还算不上是“四人帮”的爪牙,更不是暗藏在党内的阶级敌人,他充其量是个有些可笑的中间人物。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取经》是最早出现的彻底颠覆“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小说作品。

《取经》之后,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2]是1977年出现的另一篇对“文革文学”话语模态进行彻底颠覆的重要作品,它通过宋宝琦、谢惠敏两个“问题少年”的形象塑造,表现了“四人帮”专制路线对教育工作的破坏这一社会问题。进入1978年,“社会问题小说”陡然增多。成一的《顶凌下种》^[3]作为反映“四人帮”专制路线对农业生产破坏的“社会问题”小说,在人物塑造、主题表达上,与《取经》是一脉相承的。与《顶凌下种》同一刊物同期发表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是一篇反映“四人帮”专制路线对科技领域带来破坏、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的“社会问题”小说。它的发表,引发了以知识分子为讴歌对象、反映“四人帮”对科技领域带来危害的“社会问题”小说的兴起,如刘富道的小说《眼镜》^[4]、李建纲的小说《三个李》^[5]、陆文夫的小说《献身》^[6]、关庚寅的小说《“不称心”的姐夫》^[7]、孔捷生的小说《姻缘》^[8],都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

除了上面以“四人帮”对农业、教育、科技的破坏带来的社会问题为视角塑造人物形象,还有其它一些“社会问题”视角的小说在1978年不断涌现,如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9]揭示了“四人帮”专制路线下青年人对“爱情”误解、回避等畸形的社会现象,祝兴义的《抱玉岩》^[10]揭示了“四人帮”的专制运动使一对共同参加高考的恋人最终变成了师生的荒诞社会现象;王亚平的小说《神圣的使命》^[11]、齐平的小说《看守日记》^[12]写了“四人帮”对老干部的残酷迫害和老干部对“四人帮”专制行径的反抗;张洁的

[1]贾大山:《取经》,[石家庄]《河北文艺》1977年第4期。

[2]刘心武:《班主任》,[北京]《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3]成一:《顶凌下种》,[太原]《汾水》1978年第1期。

[4]刘富道:《眼镜》,[北京]《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

[5]李建纲:《三个李》,[武汉]《湖北文艺》1978年第3期。

[6]陆文夫:《献身》,[北京]《人民文学》第4期。

[7]关庚寅:《“不称心”的姐夫》,[沈阳]《鸭绿江》1978年第12期。

[8]孔捷生:《姻缘》,[广州]《作品》1978年第8期。

[9]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北京]《十月》1978年第1期。

[10]祝兴义:《抱玉岩》,[合肥]《安徽文艺》1978年第7期。

[11]王亚平:《神圣的使命》,[北京]《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

[12]齐平:《看守日记》,[北京]《解放军文艺》1978年第12期。

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1]、宗璞的小说《弦上的梦》^[2]，写了“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知识分子对“四人帮”专制行径的反抗；吴强的《灵魂的搏斗》^[3]、舒展的《复婚》^[4]、王蒙的《最宝贵的》^[5]通过对“文革”运动中迷失了方向、丧失了良知、甚至乘风作浪、乘机捞取政治利益的人物形象的描写，揭露了“四人帮”专制路线的政治荒谬性和社会危害性。

与“社会问题”小说一体两面的是“社会新气象”小说。所谓“社会新气象”小说，是指对打倒“四人帮”后“抓纲治国”的社会政治新气象新面貌进行表现和歌颂的作品，如贾平凹的《满月》^[6]、莫伸的《窗口》^[7]分别写了姐妹争相学习科技、车站售票员热情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新气象”。“社会问题”小说与“社会新气象”小说分别在批判与歌颂两种向度上，为现实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依据。许多作品，批判与歌颂兼而有之，只不过侧重点不同，如《班主任》通过宋宝琦、谢惠敏两个“问题少年”的形象塑造，重点表现了“四人帮”专制路线对教育工作的破坏，也讴歌了“抓纲治国新气象”的政治现实。

除了以“社会问题”和“社会新气象”为视角的小说，还有两种叙事流向，构成了对“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颠覆。一种是以“人”、“人性”为视角的小说，这类作品以“人”为表现中心，表达人的生命感受、生存体验，最早出现的此类作品是1978年发表的卢新华的小说《伤痕》^[8]，它不再以“社会问题”和“社会新气象”为着眼点来设置和塑造人物，而是以人物命运、心灵遭际为着眼点来展开故事。1978年出现的另一篇同类小说是陈国凯的《开门红》^[9]，写的是一位青年工人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一位心仪的姑娘后的心灵悸动和朦胧的伤感。以《伤痕》和《开门红》为先导，1979年后形成了一个“人的文学”的创作高潮，如郑义的《枫》、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冯骥才的《啊！》、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的《将军吟》等，都是以人的生存体验、心灵际遇为表现中心的重要作品。另一种是以“人民性”为视角的小说，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10]是代表性作品。“人民”是养育自己的母亲，这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鲜明的主题表达。“人民”这一概念的含义，在中国语境中长期指“大众”或曰“底层人民”，与此相应的人民性就是群众性乃至底层性。显然，俄罗斯民粹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中人民性话语的影响是巨大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与其它作品的不同，是不再将“社会问题”和“社会新气象”作为思考和表现的对象，而是将“底层民众”作为价值推崇的对象。除了《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张有德的小说《辣椒》^[11]在“人民性”的表达上也一定程度地显示出了这种民粹主义的取向。

四、结语：重新勘定“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起点

上面从理论话语与文本话语两个方面，展开的对“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话语转换状况的分析，为我们重新思考和划定“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时间分界线，以及重新确定“新时期文学”

[1]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

[2]宗璞：《弦上的梦》，〔北京〕《人民文学》1978年第12期。

[3]吴强：《灵魂的搏斗》，《上海文艺》1978年第5期。

[4]舒展：《复婚》，〔广州〕《作品》1978年第7期。

[5]王蒙：《最宝贵的》，〔广州〕《作品》1978年第7期。

[6]贾平凹：《满月儿》，《上海文艺》1978年第3期。

[7]莫伸：《窗口》，〔北京〕《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8]卢新华：《伤痕》，〔上海〕《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9]陈国凯：《开门红》，〔广州〕《广东文艺》1978年第7期。

[10]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北京〕《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

[11]张有德：《辣椒》，〔北京〕《人民文学》1978年第4期。

的话语起点,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对文学史的时间拐点如何划定,应该从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一个是新的文本话语出现的时间,另一个是指导和影响了这种新的文本话语的文学理论话语出现的时间。以中国古代文学向中国新文学的转换为例,1917年出现了胡适和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的理论文章,作为创作实绩的呼应,第二年就出现了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所以1917年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的起点。但从上文可以看出,就“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转换来说,情况比较特殊,这表现在理论话语出现的时间,如对“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的重新肯定,略略滞后于文本话语出现的时间,而且这种理论话语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它们早已经在建国后“十七年”中存在过,在被“文艺黑线专政”论长期禁锢之后,终于又在1977年末期被“解冻”而已。与中国古代文学向中国新文学的话语转换中先有理论倡导后有创作响应的状况相异,“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是文本话语走在前头的。上文已经论证,1977年初发表的贾大山的小说《取经》,是从根本上对“文革文学”话语模态构成颠覆的第一个作品,此时“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尚被禁锢和封杀。刘心武的《班主任》虽然在1977年末期发表,但它的创作却在1977年夏天已经完成^[1],不是“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这些解冻后的理论观点影响的结果。理论话语虽然出现于文本话语之后,但二者还是互为呼应互相支持的,并且,“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理论观点的解冻,还是影响和推动了此后“社会问题”小说与“社会新风尚”小说的兴起。

根据理论话语与文本话语出现时间的综合考察,我认为“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时间分界线应该定在1977年。第一,“新时期文学”颠覆“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第一波潮流是“社会问题”小说和“社会新风尚”小说,引领这波创作流向的《取经》和《班主任》就出现在1977年,“人的文学”只是继“社会问题”小说和“社会新风尚”小说之后“新时期文学”兴起的另一波创作流向。第二,“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理论话语被解冻的时间在1977年末期,它不仅对《取经》和《班主任》的创作是一种理论上的呼应,更重要的是它对此后的“社会问题”小说和“社会新风尚”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总之,颠覆“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最早的文本话语和瓦解“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文学理论话语虽然有前后之分,但都在1977年出现,所以,1977年理应成为“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时间分界线。由此推理,“新时期文学”的时间起点自然是1977年,其发轫之作是贾大山的小说《取经》与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

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的文学史叙述中,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和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其叙事逻辑是:“新时期文学”作为重回五四文学传统的人道主义文学,其起点也必须具有“人的文学”的精神内涵,而《班主任》和《伤痕》正是“文革”后最早表达了这种精神内涵的作品,所以理当然是“新时期文学”的起点。看一看几部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这种观点和叙事逻辑几乎成了一种“共识”:“随着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长期遭受压抑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五四’新文学传统开始逐渐复苏”,《班主任》是“这种复苏迹象”的“三只报春的燕子”之一^[2]。“正如‘五四’文学发端于人性解放的主题,‘文革’后文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的回归”^[3],“《班主任》和《伤痕》”是“文革”后“文学新变的滥觞”^[4]。《班主任》和《伤痕》因其“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预示”了“‘文革文学’的转变”的“发生”^[5]。

先将“新时期文学”以“人的文学”或“五四新文学传统复归”的名义本质化,然后以此为价值标准,来“照亮”符合这种本质界定的具体作品,从而在历史因果联系中赋予这些作品以“意义”,不符合

[1]刘心武:《关于小说〈班主任〉的回忆》,〔北京〕《百年潮》2006年第12期。

[2]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191页。

[3][4]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页,第401页。

[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这种本质界定的其他作品当然因其“无意义”而被遮蔽和摒弃。这是一种典型的宏大叙事的历史裁夺方式,是历史决定论在现代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宏大叙事将历史设计成一个完整的有规律性和因果联系的叙事,就文学研究来说,这种“设计”中的先入为主的价值标准所带来的“成见”,必然会对丰富复杂的文学史实造成粗暴的裁夺。《班主任》和《伤痕》被“选中”成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相应其它作品被“落选”淘汰,都是宏大叙事的既定思维对丰富的文学史实暴力裁夺的结果。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这种宏大叙事中先入为主的价值标准在“照亮”符合自身要求的作品时,可能会“放大”作品中符合自身价值标准的一面,而漠视甚或无视作品中不符合自身价值标准的一面,其遴选结果很可能是不真实的。显然,《班主任》中宋宝琦、谢惠敏两个“问题少年”所存在的心灵扭曲问题不是文本要关注的焦点,而是“四人帮”对教育工作进行破坏这一社会问题的证明,《班主任》思考和表现的中心内容是“四人帮”对教育工作进行破坏这一社会问题。但宏大叙事中先入为主的价值视角却“放大”了文本对两个“问题少年”心灵扭曲的表现,从而认定《班主任》是“人的文学”的发轫之作。事实上,从1977年末到1979年初,刘心武先后创作的《班主任》、《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十几篇小说作品,都是着眼于“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社会问题来塑造人物的,这种情况直到创作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才开始对“人”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究。第二,“新时期文学”中“人的文学”可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流向,但它不是“新时期文学”唯一的构成,如上文所论,由“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将“新时期文学”以“人的文学”或“五四新文学传统复归”的名义本质化,本身就是对“新时期文学”多元复杂的话语面貌的简单裁夺,这种本质化后的先入为主的价值视角,对“社会问题”与“社会新气象”小说的存在当然会视而不见,由此“遴选”出的“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就难以符合文学史实。

我们在勘定“新时期文学”话语起点的时候,必须回到“文革文学”话语的历史背景上,在“文革文学”话语与“新时期文学”话语的断裂现场上寻找“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显然,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在本文中虽然仍被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看待,但是,它的文学史定位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班主任》在发轫之作中已经不居首位,《取经》比它遥遥领先;第二,《班主任》隶属于“社会问题”小说潮流,不再是“人的文学”流向的开端。

〔责任编辑:平 啸〕

The Discourse Transition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terature” to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

Wu Shanzeng

Abstract: The discourse transition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terature” to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 involves two aspects: transition of literary theoretical discourse and transition of literary text discourse. The present paper, with reference to discour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llapsing process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overturn of discourse mod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terature” during 1976–1978, puts forward a new view on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terature” ended and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 began as well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 discourse.

Keyword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terature;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the starting point of discourse